

逝后的性别差异：一个“资本”视角 ——《人民日报》讣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黄顺铭 刘娜

摘要

任何社会都拥有由人、地点、时间、物件和符号所组成的“死亡系统”。在媒体化社会中，包括讣闻报道在内的各种死亡报道是死亡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遵循“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这一主流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本文从《人民日报》二十年间（1995-2014）的讣闻报道中抽取一个样本（N = 500），对逝者的“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媒体再现进行内容分析。较之于现有文献悲观的结论——“被歧视的女性”，本文的结论要相对积极得多：尽管女性成为讣闻对象的机会与男性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旦登上讣闻，她们“被再现的资本”却并不见得处于劣势地位，在几个重要方面甚至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

讣闻报道、性别差异、资本、《人民日报》、内容分析

作者简介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电邮：93302007@qq.com。刘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电邮：naliu33@126.com。

Sex Differences After Death: A “Capital” Perspective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Obituaries on the *People’s Daily*

HUANG Shunming, LIU Na

Abstract

Each society has its own “death system” composed of people, places, time, objects, and symbols. All kinds of death news including obituari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death system in a mediated society. Following the dominant academic tradition of obituary studies – “sex discrimination / differences in the obituary,” this article further draws upon Pierre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to explore obituary stories of social elites in China. Choosing a sample of obituaries

(N = 500) from the People's Daily during 1995 and 2014, the article content analyzes how decedents' cultural, power, social, and symbolic capitals are represented. In contrast with the pessimistic conclusion of "the discriminated female"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of this article is much more positive: Female is not on a par with male's chance of becoming obituary objects, but, once they get a chance, their "represented capitals" are not necessarily at a disadvantage, with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in which they have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obituary, sex difference, capital, *People's Daily*, content analysis

Authors

HUANG Shunming is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93302007@qq.com. LIU Na is lecturer of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naliu33@126.com.

DOI:10.13495/j.cnki.cjic.2016.07.009

一、引言

死亡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之一。在《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一书中,罗伯特·卡斯坦鲍姆(Robert Kastenbaum)提出一个极具涵盖力的“死亡系统”(death system)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死亡现象。这一框架引导我们去关注环绕死亡的各种事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意义网络。藉此网络,一个行动领域得以影响另一行动领域(Kastenbaum, 2016:77)。

任何社会都拥有“由人、地点、时间、物件和符号所组成”的死亡系统(Kastenbaum, 2016:77)。首先,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成为死亡系统中边缘性乃至核心性的参与者,譬如食物摄取和参加葬礼便是其中两种常见方式。其次,死亡具有一个空间维度。某些地点(如陵园和殡仪馆)固定地承载死亡,而另一些地点(如车祸现场)偶然地与死亡发生关联。不过,一个偶然与死亡发生关联的地点之社会-文化内涵有可能被永久地打上死亡的烙印。第三,死亡具有一个时间维度。它可能小到特定个体的忌辰,大至整个民族-国家的死亡纪念日,如清明节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第四,死亡经常与某些物件联系在一起,如棺材、灵车与死亡证明。第五,死亡离不开语言性或图像性的符号,譬如孝布、青纱、哀乐、讣闻、死亡通告,以及表述死亡的语汇。卡斯坦鲍姆还指出,死亡系统发挥着警告与预测、避免死亡、关怀濒死者、处理死者、理解死亡、死后的社会团结等一系列社会功能(Kastenbaum, 2016:81-95)。

在媒介化社会中,各种类型的死亡报道——讣闻、死亡通告,以及其他死亡报道形式(例如自然灾害中的死亡)——是死亡系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讣闻报道。一方面,很多媒体都相当重视讣闻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和《独立报》便是著例(Johnson,2007:7)。另一方面,透过媒体接触讣闻报道是人们日常参与死亡系统的基本方式,不少人甚至是“讣迷”。有学者幽默地称讣迷为“讣教”(the Church of Obituaries),并从中区分出狂热分子和虔诚之士(Johnson, 2007: 6-7)。

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已提出或借用了一系列理论视角来研究讣闻。有人认为讣闻乃“日常生活中死亡自我的呈现”,牵涉到对死者及其家属的“印象管理”的问题(Bonsu, 2007);有人认为讣闻是一种“对于逝者及其家属的具有社会正当性的广告”(Lawuyi, 1991);有人认为,讣闻是一种“公开的承认”(Kastenbaum, Peyton & Kastenbaum, 1977),“讣闻写作是一种公共纪念的行动”(Davies, 1994),“讣闻是一种集体记忆”(Fowler, 2007)。这些视角尽管各有侧重,却不约而同地肯定了讣闻的社会性与公共性。

本文将从另一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讣闻,即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Bourdieu, 2002; Bourdieu & Wacquant, 1992),从我国最权威的党报《人民日报》过去二十年间(1995-2014)抽取一个讣闻报道样本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检视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时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歧视/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讣闻中的性别歧视

讣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成为学者们大量研究的一个题目(Starck, 2004: 35)。其中,“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是最主流的学术传统。

1977年,卡斯坦鲍姆等人发表题为《死后的性别歧视》的开创性文章。他们对死亡通告(death notice)和讣闻(obituary)严加区分,尽管两者都是赋予逝者社会承认的具体形式。前者是一种高度标准化的格式:只有一个段落,小号字编排,按字母顺序罗列逝者;而后者为正常字号,每篇各有标题,长度和格式也灵活多样。透过《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一个月的讣闻和死亡通告,他们试图考察人们在死亡后遭遇到的性别歧视问题。结果发现,死亡通告中逝者的性别构成平衡,而讣闻对象的性别却非常失衡,他们称之为“一个清晰的男性偏好模式”(a clear

pattern of male preference)——男性获得讣闻和配发照片的机会均远高于女性。文末还提到一种性别歧视现象,即女性往往会因为与男性的某种关系(如作为妻子或母亲)而进入讣闻,而男性却极少被这样对待。他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去检验“女性因与男性的某些关系而获得讣闻”的假设(Kastenbaum, Peyton & Kastenbaum, 1977: 357-358)。这篇文献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这一主流学术传统。

很快便有人“重复”了上述开创性研究。伯纳德·斯皮尔卡(Bernard Spilka)等人以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丹佛邮报》和《罗基山脉新闻报》一年的讣闻报道作为样本,并假设西部报纸上的性别歧视小于东部报纸,因为“美国西部对于女性的气氛要更自由和不那么偏见”(Spilka, Lacey & Gelb, 1979:231)。然而,却并无证据表明西部报纸比东部报纸对讣闻对象的选择更加平等。七十年代末,另两位学者分析《纽约时报》半年的讣闻报道,发现绝大多数讣闻对象为男性(Stillion & Shamblin, 1985)。

随后十五年内,“关于讣闻中性别歧视的研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极少有人再对讣闻中的性别歧视进行“量化”(Maybury, 1995:29)。而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讣闻研究的主要兴趣开始转向纵贯性(longitudinal)和比较性(comparative)的研究。

在纵贯研究方面,迈克尔·凯尔(Michael Kearl)从《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半个多世纪内(1923-1979)抽取出一个2209篇讣闻的随机样本。结果发现:男性不仅总体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每一个时期亦然,最悬殊时男女之比高达10比1;不过,讣闻长度和配发照片方面却并未发现性别歧视,其中女性照片甚至还略占优势(Kearl, 1986: 65-78)。盖瑞·朗(Gary Long)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段内(1856-1972)抽取出一个讣闻样本,也证实美国的讣闻报道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女性的讣闻报道强调家庭,而弱化工作的显著性”(Long, 1987:987)。他还精辟地指出:“跟活着时一样,人们逝后也是不平等的;[他们的]过去在体现核心文化主题(core-cultural themes)的能力方面并不相同”(Long, 1987:989)。而最雄心勃勃的一项纵贯研究恐怕当属约翰·鲍尔(John Ball)和吉尔·琼斯(Jill Jones)的专著《最后的名望》。他们系统研究了《纽约时报》六年时间内(1993-1996)发表的近万条讣闻(N=9325),发现性别歧视异常严重:女性逝者不足五分之一(17%)(Ball & Jones, 2000:43)。

在比较研究方面,卡罗尔·马伯里(Karol Maybury)发现卡斯坦鲍姆等人的开

创性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设计缺陷——两份报纸均来自美国东海岸，于是从东、西海岸各抽取一份报纸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不管在《波士顿环球报》还是《圣克里门托蜜蜂报》上，男性逝者均显著地多于女性，但讣闻对象之间却并无显著的地区差异；在配发照片方面，男性与女性之比为4比1(Maybury, 1995:27-37)。罗宾·摩尔门(Robin Moremen)和凯茜·克拉达克(Cathy Craddock)的研究设计更为精致，比较了美国不同地区四份大都市报纸(即《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上的死亡通告和讣闻。他们发现：在死亡通告的比例上，只有《纽约时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然而，在讣闻的比例上，不仅每份报纸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四个地区之间也有显著差异(Moremen & Craddock, 1998: 241-254)。而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则对英国四家高级报纸(即《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的学者讣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讣闻对象是男性(Tight, 2008:125-135)。奈杰尔·斯达克(Nigel Starck)也考察了这四份报纸，发现它们在选择讣闻对象时“稳定地偏倚于男性”(Starck, 2008:916)。

上述回顾显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讣闻中性别歧视/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讣闻对象的性别构成、不同性别逝者的讣闻长度，以及配发图片等几个维度而展开。

本文也将以“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的主流学术传统作为问题意识。不过，我们并不打算简单地因循上述研究维度，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该理论有望为分析中国新闻媒体上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新路径。

(二) “资本”类型与讣闻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理论原创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布尔迪厄通过一系列著作建构出了一整套高度复杂却又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中，“场域”(field)、“资本”(capital)与“惯习”(habitus)就是其中几个核心概念(Bourdieu, 1984; 1991; 1993; 1996; 2002;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根据需要，本文只关注其资本理论。

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起来的历史”，进而把资本定义为一个行动者“所积累的劳动”(accumulated labor)(Bourdieu, 2002:280)。要积累资本就意味着行动者必须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所积累的资本也存在质(不同类型的资本)与量(不同数量的资本)之分。他区分出资本的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并指出不同资

本形式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转换。

资本仰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域，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作为代价，而这种转换是它在某个场域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资本可以三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经济资本，能立即而直接地转化为货币，并可以产权的形式而得以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为经济资本，并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而得以制度化；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能转换为经济资本，并以高贵头衔的形式而得以制度化。（Bourdieu, 2002:281）（强调为原文所加）

布尔迪厄所言的经济资本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并无二致，因此该文中着墨甚少。尽管经济资本——具体表现为财富、收入和资产等——是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然而他“反对将其他类型的资本化约成经济资本，因为，其他类型的资本有其独特的传递、转换和积累逻辑”（宫留记，2009:117）。鉴于我国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中极少再现逝者所创造、积累或者继承的经济资本，故该资本将不在分析之列。

文化资本具有三种存在形态。一是“身体化的状态”，即行动者心智和肉体上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表现为谈吐、教养、气质和审美品味等。二是“客观化的状态”，指物化的文化财产，表现为图书和画作等。三是“制度化的状态”，指经由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所认可的各种资格，如教育文凭和资格证书（Bourdieu, 2002:282-286）。在我国社会精英讣闻中，几乎不会提及逝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通常只有当逝者为作家、艺术家之类的文化生产者时，才偶有提及；相对经常提及的是制度化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对逝者受教育经历的叙述。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讣闻报道在再现制度化文化资本时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布尔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行动者们）拥有一个彼此熟悉和承认的、已经多少制度化了的持久网络相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这些资源是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当成员拥有这一网络时，他们就可以得到一种集体持有的资本的支持，而这种资本是他们赢得各种声誉的一个‘凭证’”（Bourdieu, 2002:286）。一群行动者一旦共享某种名称，譬如家族、阶级、部落、学校以及政党，就意味着他们已结成为一个相对持久的社会网络。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和（或）动员”（Lin, 2002:29）。在我国社会精英讣闻报道中，不时提及逝者的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叙述逝者生前或者逝后不久而与之发生过联系的人

及其关系状况。本文希望考察的是，讣闻报道在再现社会资本时有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此外，布尔迪厄还提出了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即“象征资本”(Bourdieu, 1984; 1998)。象征资本指一个人在各种社会空间中获得的荣誉、声望、威信以及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本。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在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来研究图书出版场域时，就系统地考察了象征资本。他指出，“最好把象征资本理解为某些个体或机构所积累的声望、承认和尊敬”(Thompson, 2010:8)。在考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婚姻策略时，布尔迪厄发现象征资本极端重要：缔结婚约的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让有名望的亲戚作为担保人而出面，公开展示各自拥有的象征资本；拥有被认可的象征资本，就有望缔结到一门有名望的姻亲。在我国社会精英讣闻报道中，不时提及逝者的象征资本，主要表现为由正式的组织机构所授予的荣誉和承认（如一位军人的军衔和勋章）和非正式的社会性声望（如一位文学工作者被尊为“著名作家”）。本文希望考察的是，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象征资本时有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最后，针对中国社会精英讣闻的实际状况，本文还将考察另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即“权力资本”。我们将它定义为：行动者拥有的、与其所在职业和（或）政治场域里的责任、权力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资源。例如，一家报馆的总编辑和采访部主任就拥有各自的职业权力，前者的权力比后者大；倘若这位老总还刚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他就在政治场域里拥有相应的权力。在我国社会精英讣闻报道中，存在大量关于逝者职业性和政治性的权力资本的叙述。本文希望考察的是，讣闻报道在再现权力资本时有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三）研究假设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四组研究假设。

假设1：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文化资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细化为3个次级假设：

假设1a：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受教育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1b：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高等教育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1c：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海外留学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权力资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细化为3个次级假设：

假设2a：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职业权力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b: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政治权力场域宽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c: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政治权力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社会资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细化为7个次级假设:

假设3a: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b: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当前国家领导人象征性行为的标题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c: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数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d: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亲属关系人的提及方面存在差异。

假设3e: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社会关系人总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f: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g: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混合关系中的积极关系人比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4: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象征资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细化为2个次级假设:

假设4a: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正式职业荣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4b: 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抽取《人民日报》1995-2014年间的讣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人民日报》是我国级别最高的党报,其讣闻对象几乎皆为社会精英,因此提供了一种对于社会精英最官方、最权威的论述与评价,代表着主导性政治权力机构对于个体的最高承认。这一官方媒介话语当然并非评价个体生命史的唯一文本,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文本,对逝者乃至其家属发挥着重要的“地位授予”(status-conferral)的社会功能(Lazarsfeld & Merton, 1957:461-462)。

我们首先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以“逝世”为标题关键词,检索到3091篇文

章。然后,对初检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只保留逝世被作为一种“事件”而非“纪念”的那些篇目。比如,《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1996-04-01, p.10)就被排除。随后,只保留逝者身份为“大陆人”“港澳台人士”和“其他海外华人”的那些篇目。接下来,根据两个基本原则,对每位逝者只保留一篇文章。一是硬新闻优先原则,若报纸针对同一逝者既有硬新闻,也有人物特稿等软新闻,保留前者。譬如,叶笃正逝世后,人物特稿《坐看风云七十年》(2013-10-18, p.9)比硬新闻《叶笃正同志逝世》(2013-12-21, p.4)早两个多月发表,但保留后者。二是时间靠前原则,若报纸针对同一逝者有不止一篇硬新闻,保留最早的那一篇。比如,面对先后发表的两篇硬新闻《百岁传奇老人夏征农逝世》(2008-10-06, p.4)和《夏征农同志逝世》(2008-12-12, p.4),保留前者。偶尔,同一篇讣闻报道在不同日期刊登了不止一遍,保留最早的那一篇。例如,《陈用文同志逝世》(2007-11-04, p.4; 2007-12-03, p.4)就先后刊登了两遍。经过这一道筛选,还剩2444篇文章。我们逐篇检查逝者性别,发现女性逝者非常少(113人,占4.6%)。鉴于本文旨在考察讣闻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决定将女性逝者全部纳入分析。我们从剩下的2331篇男性讣闻中随机抽取出387篇文章,组成一个500篇文章的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纵贯研究设计。样本的年份分布相对均衡,最多的年份31篇(6.2%),最少者18篇(3.6%)。而对于任何年份,男逝者都多于女逝者,其中最悬殊的年份21比1,最平衡的年份12比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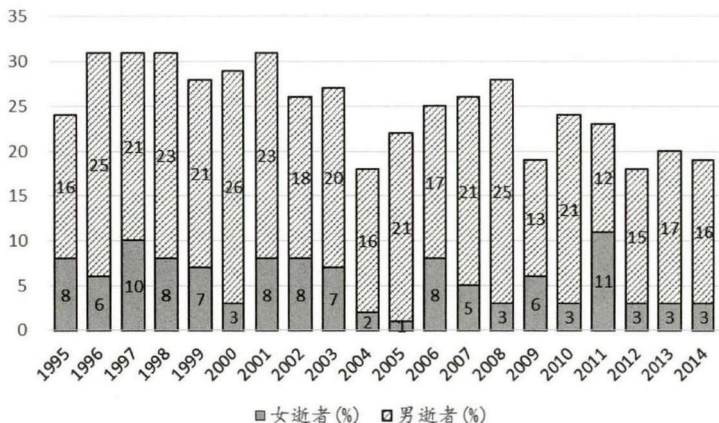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性别构成的年份分布(1995—2014)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以《人民日报》的讣闻报道为研究对象,我们却吃惊地

发现,绝大多数讣闻(99.2%)并非由该报记者自采,而是“转载”新华社的电讯稿。仅有的4篇自采稿中,其中三篇讣闻对象为本报员工——胡济邦(1995-02-15, p.4)、何匡(1999-07-14, p.4)和肖凤(2004-07-07, p.4)。这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社会精英逝世后,新华社是讣闻报道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而《人民日报》为“次要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尽管如此,后者的新闻把关行为对于社会真实的建构仍不乏其重要意义。譬如,如何从新华社众多讣闻电讯稿中选择某些来转载,何时转载,原文照登抑或有所增删,赋予稿件何种版面地位,如何通过版面元素在不同讣闻之间建构意义联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 测量

1. 文化资本

本研究只考察逝者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具体化为以下三个变量:其一,“受教育经历”(0 = 未提及,1 = 提及),适用于每一位逝者。其二,若文中提及受教育经历,继续编码“高等教育经历”(0 = 未提及,1 = 提及,99 = 不适用。“不适用”在统计分析时为缺失值。)。其三,若提及受教育经历,继续编码“海外留学经历”(0 = 未提及,1 = 提及,99 = 不适用)。

2. 权力资本

大多数文章的主要篇幅用于叙述逝者一生中在不同工作单位所历任的头衔,为此,我们建构出“职业权力资本量”,即讣闻中提及逝者一生历任工作头衔的总数量。一个人工作头衔总量越多并不必然意味着职业权力越大,然而头衔多寡却能很好地反映其职业权力资本的流动性程度。

讣闻中不时提及逝者在三大全国性政治权力场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诸如代表、候补代表、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常务委员。为此,我们建构出“政治权力场域宽度”和“政治权力资本量”两个变量。政治权力场域宽度的测量方法为:只要逝者在一个权力场域中占有任何一种角色,就记作1个;若逝者在同一场域中不止一种角色,仍只算1个。该变量取值范围为0-3个,3表示逝者在三大政治场域中都拥有头衔。至于政治权力资本量,就是文中提及逝者一生在三种政治场域中历任头衔的总和。例如,《唐教庆同志逝世》一文导语提到逝者为“全国政协原常委”,文末又说他是“中共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2008-07-27, p.4)。那么,政治权力场域宽度就等于3,政

治权力资本量等于9。场域宽度和资本总量越大并不必然意味着逝者的政治权力越大,然而这两个变量却可以很好地反映逝者一生在全国性政治生活中的显著性程度。

3. 社会资本

讣闻报道会在正文甚至标题中叙述逝者生命史中与之发生过积极或消极关联的社会关系人,譬如家人、朋友、同事、敌人,以及国家领导人。为此,本文建构出七个社会资本变量。其一,“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0 = 未提及,1 = 提及),指他们对逝者及其家属有无看望、慰问或哀悼等象征性举动。其二,“当前国家领导人象征性行为的标题化”(0 = 否,1 = 是,99 = 不适用)。其三,若提及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继续编码“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数量”,其中“不适用”赋值999。其四,“亲属关系人的提及”(0 = 未提及,1 = 提及)。其五,“社会关系人总量”,即各类关系人的总和。本文所谓“社会关系人”指具有确切指涉的自然人,最典型的表述方式是指名道姓,有时虽未具名,但可由表述确知关系人的数量乃至姓名,譬如“四人帮”这一表述。其六,“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1 = 积极,2 = 消极,3 = 混合,99 = 不适用)。最后,“混合关系中的积极关系人比例”,其中“不适用”赋值99。

4. 象征资本

讣闻报道中存在两种象征资本:一是某个正式的组织机构授予逝者荣誉,如军衔、军功与奖章;二是赋予逝者非正式的社会声望,如“著名×××”和“优秀×××”。为此,本文建构出两个象征资本变量:“正式职业荣誉”(0 = 未提及,1 = 提及)和“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使用”(0 = 未使用,1 = 使用)。

四、数据分析

(一)文化资本与性别差异

超过三分之一(36.4%,182篇)文章再现了逝者的受教育经历。如表1所示,六成(60.2%)女性讣闻提及这种经历,是男性讣闻(29.5%)的两倍多。卡方检验显示,假设1a(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受教育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获得支持: $\chi^2 = 35.65, df = 1, p < 0.001$ 。

在提及受教育经历的182篇文章中,绝大多数(87.9%)提及的是高等教育经历,这说明高等教育经历是一个积极的公共记忆元素。如表1所示,九成多(92.6%)女性讣闻提及这种经历,比男性讣闻高7.5%。卡方检验显示,假设1b

(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高等教育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被拒绝:
 $\chi^2 = 2.29, df = 1, p = 0.130$ 。

在提及教育经历的文章中,超过五分之一(22.0%)提及海外留学经历。如表1所示,三成(30.9%)女性讣闻提及这种经历,比男性讣闻高14%。卡方检验显示,假设1c(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海外留学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支持: $\chi^2 = 5.02, df = 1, p = 0.025$ 。由于海外留学经历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记忆元素,因此当逝者拥有此种不凡经历时,讣闻通常会提及甚至强调它。

表1 逝者文化资本的性别差异

逝者性别	受教育经历			受高等教育经历			海外留学经历		
	未提及	提及	合计	未提及	提及	合计	未提及	提及	合计
女性	39.8 (45)	60.2 (68)	100.0 (113)	7.4 (5)	92.6 (63)	100.0 (68)	69.1 (47)	30.9 (21)	100.0 (68)
男性	70.5 (273)	29.5 (114)	100.0 (387)	14.9 (17)	85.1 (97)	100.0 (114)	83.3 (95)	16.7 (19)	100.0 (114)
合计	63.6 (318)	36.4 (182)	100.0 (500)	12.1 (22)	87.9 (160)	100.0 (182)	78.0 (142)	22.0 (40)	100.0 (182)

我们还得到几个质性的研究发现。首先,讣闻报道对于文化资本的重视程度完全无法跟职业权力资本(下文详述)相提并论。前者几乎总是穿插于后者,样本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以一个独立段落来详述逝者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例如,《刘英同志逝世》(2002-09-04, p. 4)这样写道:

刘英原名郑杰,1905年10月出生於湖南长沙。1924年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五卅”运动期间,她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7年2月,党组织派她到湖南全省总工会工作,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干事。1927年11月,她被选为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1929年春,中央派她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1932年底回国,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苏区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委常委,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长。1934年,中央派她到于都县两次担任扩红突击队长,受到军委动员部的嘉奖。(黑体为作者所加)

上述引文中,教育经历相对于职业经历而言,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此外,样本中也未见到任何一篇文章完整地叙述逝者各个阶段的教育经历,只有极个别篇什交代了逝者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譬如,“1945年后,(项淳一)在上海沪江大

学附中、沪江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时，曾任地下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项淳一同志逝世》，2014-03-23, p.4）。即便是本例中，叙事重心仍然落脚于职业经历。

其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有志青年从国统区奔赴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延安），其中部分人被选拔到共产党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系统地接受知识和革命的再教育。在紧迫的革命和战争局势下，学习期限一般不太长，然而讣闻对于他们“盖棺定论”之时，却往往会叙述其教育经历的转折性质。例如，“（缪海）1936年冬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先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奔赴陕北，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6月到新华通讯社工作，担任通讯科负责人”（《缪海同志逝世》，1996-12-09, p.4）。

第三，在革命战争年代，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选拔了一些人到苏联深造。这种“革命留学”的教育经历是一种稀缺而不凡的资历，因此讣闻报道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一记忆元素。有些文章甚至明确地指出留苏是“受党派遣”的革命神圣性。例如，“同年10月，（王一）由中共中央决定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王一同志逝世》，2001-12-27, p.4）；“1927年8月杨春受党派遣赴苏联学习，直到1955年9月回国”（《杨春同志逝世》，2004-06-29, p.4）。

（二）权力资本与性别差异

讣闻报道对于职业权力资本的叙述比政治权力资本要普遍得多。这自在情理之中：任何人只要进入某一职业场域工作，就必然会扮演某个或某些职业角色，但却未必愿意或有机会进入政治场域之中。

就职业权力资本而言，只有个别文章完全未提及逝者的任何工作头衔（2.2%，11篇）。季羨林的讣闻《著名学者季羨林逝世》（2009-07-12, p.2）便是其中之一。文中罗列了一大堆非正式社会声望的标签，对工作头衔却只字不提，尽管他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以及北京大学终身教授等职务。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记者李舫）著名学者季羨林今天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季羨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据悉，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绝大多数讣闻报道的主体部分都用于叙述——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叙述——逝者一生历任的各种工作头衔。有时叙述很具体，同时交代单位和头衔；有时却只笼统地提及头衔；而有时则是一种混合式的叙述。下面第一段引文中均为具体的头衔，第二段引文是混合式的。

（韩增胜同志）历任陕北瓦窑堡共青团特委支部巡察员，共青团肤施县委书记，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米脂县联保队指导员，中央党校校部生产科科长，中央机关生产指导处处长，中央机关总务处副处长，中央机关生产处处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招待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热河省人民政府秘书处副处长、财政厅被服生产处处长，冀察热辽政府办事处直属供给处处长，东北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经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华北协作区办事组组长等职。（《韩增胜同志逝世》，2001-03-30, p.4）

（杜西书同志）历任班长、副政治指导员、团政委、支队政委、师政委、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政委、海军航空兵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1961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杜西书同志逝世》，1995-01-10, p.4）

在叙述到职业权力资本的489篇文章中，提及的工作头衔异常悬殊：最小值1个，最大值43个，平均16.2个（SD = 8.10）。大约五分之一（21.1%）文章中头衔在1到9个之间，超过四成（43.8%）在10到19之间，大约三成（31.1%）在20-29个之间，只有4.1%在30个以上。按性别分组，男性讣闻的平均工作头衔17.4个（SD = 7.55），女性讣闻11.9个（SD = 8.58），相差5.5个。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2a（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职业权力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获得支持： $t = -6.06$, $df = 158.98$, $p < 0.001$ 。更准确地说，男性讣闻中逝者的平均工作头衔显著地多于女性讣闻。

就政治权力资本而言，近六成（58.4%，292篇）文章提及逝者在三大政治场域中所历任的头衔。按性别分组，三成（30.1%，34篇）女性讣闻未提及逝者在这些场域中的任何头衔，男性讣闻的相应比例为45.0%（174篇）；在场域宽度为1、2和3的比例上，女性讣闻均不同程度地高于男性讣闻；不论男性讣闻还是女性讣闻，均只有不到一成文章同时提及逝者在三大场域中的政治头衔。平均而言，男性讣闻的政治权力场域宽度为0.85个，女性讣闻1.10个，相差0.25个。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2b（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政治权力场域宽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获得支持： $t = 2.54$, $df = 498$, $p = 0.011$ 。更准确地说，女性讣闻中逝者的政治

权力场域宽度显著地大于男性讣闻。

讣闻报道提及的政治权力资本量相当悬殊：最小值0个，最大值23个，平均2.2个（SD = 2.94）。政治权力资本量在1-4个者占42.0%（210篇），在5-9个者占13.6%（68篇），在10个及以上者仅2.8%（14篇）。平均而言，男性讣闻的政治权力资本量2.0个（SD = 2.92），女性讣闻2.9个（SD = 2.92），相差0.9个。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2c（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政治权力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支持： $t = 2.88$, $df = 489$, $p = 0.004$ 。更准确地说，女性讣闻中逝者的政治权力资本量显著地大于男性讣闻。

还有几个质性的发现值得一提。讣闻报道对于权力资本的再现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讣闻报道若同时述及职业权力资本和政治权力资本，通常会先交代职业权力资本，再交代政治权力资本，且各自独立成段。其次，职业权力资本和（或）政治权力资本的部分头衔会被纳入导语，作为逝者的身份标签。身份标签的选择大致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最近”原则，即逝世前所担任的头衔；二是“最高”原则，即一生历任角色中最高的那一个或几个。此外，导语和主体部分在叙述职业或者政治头衔时还存在一个微妙差异：前者往往在头衔前衬以“原”字，表明一种历史性质；后者从不使用该字眼，往往以“历任”一词统摄所要罗列的头衔。譬如，下面这个导语中就用了三个“原”字：“中共黑龙江省委原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政协原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剑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28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0岁”（《李剑白同志逝世》，2008-06-03, p.4）。

（三）社会资本与性别差异

讣闻报道对于当前国家领导人看望、慰问或哀悼逝者及家属的象征性行为的叙述有力地折射了一种“崇尚权力”的社会-文化心理。半数文章（51.2%，256篇）明确提及这种象征性行为。其中，六成（61.9%）女性讣闻提及这种行为，而男性讣闻为48.1%。卡方检验显示，假设3a（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支持： $\chi^2 = 6.75$, $df = 1$, $p = 0.009$ 。

表2 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与逝者性别的交叉表

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	逝者性别		合计
	女性	男性	
未提及	38.1 (43)	51.9 (201)	48.8 (244)
提及	61.9 (70)	48.1 (186)	51.2 (256)
合计	100.0 (113)	100.0 (387)	100.0 (500)

看望、慰问或哀悼等象征性行为在讣闻报道中被赋予了极大的显著性：通常紧随导语之后，独立成段。对于少数特别重要的逝者，这些行为甚至还会被标题化——以“副题”的方式予以强调。样本中，只有10篇（3.9%）文章采用了标题化的处理，其中针对不同性别逝者的各占一半。卡方检验显示，假设3b（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当前国家领导人象征性行为的标题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被拒绝：

$$\chi^2 = 2.57, df = 1, p = 0.109.$$

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数量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图2显示了过去二十年间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象征性行为的变化趋势，它清楚地表明：近年来，讣闻报道已抛弃过去那种明确甚至详细地罗列当前国家领导人姓名的做法。在最近四年的讣闻中，尽管73.8%（59篇）提及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然而施动者的具名比例为零，已基本沦为下面这种所指模糊的标准格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变化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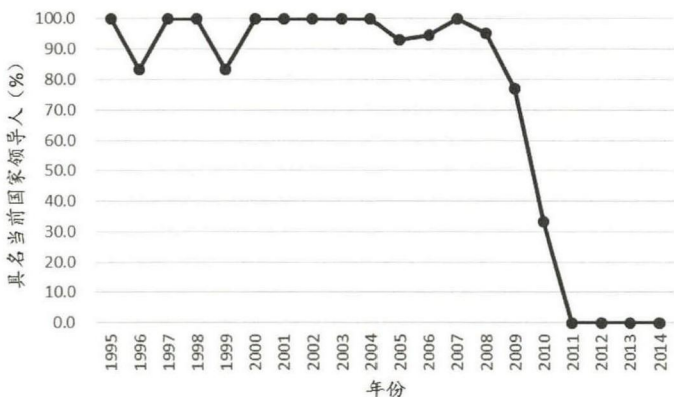


图2 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的比例变化趋势 (1995-2014)

在提及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的180篇文章中，领导人数量异常悬殊：最小值1人，最大值162人，平均值18.16人（SD = 23.42）。按性别分组，男性讣闻平均16.8人（SD = 21.11），女性讣闻21.9人（SD = 28.92），相差5.1人。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3c（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数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被拒绝： $t = 1.29, df = 178, p = 0.199$ 。

样本中，有四位逝者的讣闻罗列的当前国家领导人在100位以上，其中三位是

女性逝者，即刘英、陈琮英和黄杰，其丈夫均为显赫的政治人物——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任弼时、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其中，黄杰的讣闻并未以任何方式透露她是徐向前夫人这一身份（《黄杰同志逝世》，2007-07-06, p.4）。以下是刘英的讣闻叙述领导人象征行为的段落，掐头去尾之后全是姓名：

刘英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乔石、宋平、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巴金、钱伟长、任建新、宋健、李贵鲜、张思卿、钱正英、丁光训、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和李德生、张劲夫、张爱萍、段君毅、彭冲、谷牧、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张震、倪志福、陈慕华、王丙乾、吴学谦、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钱学森、苏步青、董寅初、邓力群、张廷发、韩光，中央军委委员于永波、王瑞林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刘英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刘英同志逝世》，2002-09-04, p.4）

就亲属关系人而言，样本中存在三种再现亲属关系人的方式。其一，明确提及逝者亲属关系中的个体，尤其是配偶，偶尔也会提及子女或其他成员。例如，沈粹缜的讣闻除了提及亡夫邹韬奋之外，还写道，“沈粹缜的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夫人偕子女、亲属为她送行”（《沈粹缜同志在上海逝世》，1997-01-22, p.4）。女性讣闻有时会提及显赫的亡夫，譬如“老舍先生夫人胡絮青”（《胡絮青老人逝世》，2001-05-22, p.4），“王光美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逝世》，2006-10-19, p.4），“卓琳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逝世》，2009-07-30, p.1），“（何泽慧）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逝世》，2011-06-21, p.4），“李文宜与罗亦农同志结成革命伴侣”（《李文宜同志逝世》，1997-05-24, p.2），“（陈琮英）与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同志结为革命伴侣”（《陈琮英同志逝世》，2003-06-07, p.4）。相对而言，“夫人”比“革命伴侣”的表述更为常用。有时，讣闻会隐晦地

表述夫妻关系。曾志的讣闻虽未点明她作为陶铸夫人的身份，却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志同志和陶铸同志一起与‘四人帮’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曾志同志在京逝世》，1998-07-05, p.2）。夫妻关系甚至会通过新闻标题来予以强调，譬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逝世”（《刘志丹夫人同桂荣逝世》，1999-05-07, p.4）。然而，男性讣闻却不存在借显赫的亡妻来抬升逝者地位的情形。此外，不论男性讣闻还是女性讣闻，都有可能提及已故的显赫的父亲或祖父，如“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同志”（《杨拯民同志逝世》，1998-10-25, p.2），“朱德同志的女儿（朱敏同志）”（《朱敏同志逝世》，2009-04-20, p.4），“李慈君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的孙女”（《李慈君同志逝世》，2006-02-12, p.4）。女性逝者的讣闻甚至可能提到丈夫的父亲，如“邵华同志是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夫人”（《邵华同志逝世》，2008-07-03, p.4）。

其二，讣闻只模糊地提及逝者的家庭出身状况，而不提特定的个体。例如，“李克非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定县农民家庭”（《李克非同志逝世》，1995-03-17, p.4），“曾志同志一九一一年四月四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曾志同志在京逝世》，1998-07-05, p.2），“（钱江）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钱江同志逝世》，2001-05-15, p.4）。

其三，“家属/亲属”被作为一种笼统性表述的受动者而出现在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中。例如，“胡锦涛、尉健行、王汉斌、万里、薄一波、陈俊生、孙孚凌等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程宏毅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程宏毅同志逝世》，1997-07-21, p.4）；“鲁之沫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鲁之沫同志逝世》，2010-12-22, p.4）。相对而言，“家属”比“亲属”更为常用。极个别时候，在这种施动-受动关系中会点明家属的姓名。钱钟书的讣闻便是如此：“12月19日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打电话，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杨绛先生保重身体。杨绛先生深表感谢”（《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逝世》，1998-12-21, p.1）。

接近三成（29.2%，146篇）文章提及逝者的亲属关系人。其中，不足四分之一（23.5%，91篇）男性讣闻存在这种提及，女性讣闻为前者的两倍多（48.7%，55篇）。卡方检验显示，假设3d（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亲属关系人的提及方面存在差异）得到支持： $\chi^2 = 26.78$, $df = 1$, $p < 0.001$ 。

表3 亲属关系人的提及与逝者性别的交叉表

亲属关系人的提及	逝者性别		合计
	女性	男性	
未提及	51.3 (58)	76.5 (296)	70.8 (354)
提及	48.7 (55)	23.5 (91)	29.2 (146)
合计	100.0 (113)	100.0 (387)	100.0 (500)

半数文章（259篇，51.8%）未提及任何一个所指明确的社会关系人。在至少提及1个社会关系人的文章中，社会关系人总量异常悬殊：最小值1人，最大值162人，平均值14.6人（SD = 21.61）。其中，男性讣闻的社会关系人总量平均14.2人（SD = 19.70），女性讣闻15.6人（SD = 25.53），相差1.4人。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3e（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社会关系人总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被拒绝： $t = 0.45$, $df = 239$, $p = 0.653$ 。

就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而言，86.3%（208篇）的文章只提及积极关系人，7.5%（18篇）只提及消极关系人，另有5.8%（15篇）同时提及积极和消极的关系人。按性别分组，绝大多数男性讣闻和女性讣闻提及的都是积极关系，它们在其他两种关系上有较大差异。卡方检验显示，假设3f（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支持： $\chi^2 = 12.44$, $df = 2$, $p = 0.002$ 。

表4 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与逝者性别的交互表

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	逝者性别		合计
	女性	男性	
积极关系	83.8 (62)	87.4 (146)	86.3 (208)
消极关系	2.7 (2)	9.6 (16)	7.5 (18)
混合关系	13.5 (10)	3.0 (5)	6.2 (15)
合计	100.0 (74)	100.0 (167)	100.0 (241)

最后，混合关系的讣闻报道中积极社会关系人的比例差距不太大：最小值0.64，最大值0.96，平均值0.83（SD = 0.11）。由最小值大于0.5可得出结论：即使在混合关系情境下，讣闻报道也始终以积极关系人为主，从而确保了它作为一种“积极性的记忆文本”的性质。按性别分组，男性讣闻平均0.79（SD = 0.12），女性讣闻0.85（SD = 0.10），相差0.06。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假设3g（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混合关系中的积极关系人比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被拒绝： $t = 0.97$, df

= 13, $p = 0.348$ 。不过,属于混合关系的文章数量极少(15篇),因此这一假设检验结果未必具有说服力。

(四) 象征资本与性别差异

四成(40.4%)文章明确地提及某些正式组织机构授予逝者的职业荣誉。其中,45.5%(176篇)的男性讣闻提及这种荣誉,几乎两倍于女性讣闻(23.0%)。卡方检验显示,假设4a(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提及逝者的正式职业荣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支持: $\chi^2 = 18.34$, $df = 1$, $p < 0.001$ 。

表5 正式职业荣誉与逝者性别的交互表

正式职业荣誉	逝者性别		合计
	女性	男性	
未提及	77.0 (87)	54.5 (211)	59.6 (298)
提及	23.0 (26)	45.5 (176)	40.4 (202)
合计	100.0 (113)	100.0 (387)	100.0 (500)

正式职业荣誉最常见于讣闻报道的结尾。我们发现,来自不同制度场域的逝者在这种荣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军事领域的逝者最有可能提及正式职业荣誉,其比例比文化、艺术、教育与科技领域的逝者高得多,而政治/政府领域的逝者则极少被提及这种荣誉。军人逝者的荣誉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军衔,二是勋章、奖章及荣誉章。例如,“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师贵庭同志逝世》,2005-04-09, p.4)。不过,军事荣誉的授予机构却鲜有交代。“1955年,梁骥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并授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梁骥同志逝世》,2003-03-13, p. 2),这里交代了荣誉授予机构。个别逝者还获得了外国政府授予的勋/奖章。例如,袁升平“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国旗二级勋章两枚、独立自由一级勋章一枚”(《袁升平同志逝世》,2003-09-10, p.4)。

讣闻报道在使用形容词来赋予逝者非正式社会声望方面相当谨慎。这自在情理之中:因为任何类型、任何层次的组织机构都能生产出林林总总的正式荣誉,这些荣誉的“社会购买力”往往相去甚远,而非正式社会声望则通常在特定的制度领域之中(如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拥有很大的“社会购买力”。如表6所示,略强于五分之一(23.6%, 118篇)文章使用了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其中,45.1%(51篇)的女性讣闻中有声望形容词,是男性讣闻(17.3%)的两倍多。卡方

检验显示,假设4b(即不同性别的讣闻报道在逝者的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获得支持: $\chi^2 = 37.54, df = 1, p < 0.001$ 。

表6 非正式社会名望与逝者性别的交叉表

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	逝者性别		合计
	女性	男性	
未使用	54.9 (62)	82.7 (320)	76.4 (382)
使用	45.1 (51)	17.3 (67)	23.6 (112)
合计	100.0 (113)	100.0 (387)	100.0 (500)

描述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最常见于标题和导语,并且往往同时出现在这两个相邻的关键性位置,这似乎说明:讣闻作者试图故意通过及时的“重复”,以便引起和强化读者对于这些形容词的注意力。同时,针对不同制度场域的逝者的形容词明显不同。“著名×××”的标签最经常赋予文化、艺术、教育及科技领域中受人尊敬的专家们。样本中至少不下20篇文章标题中就含有“著名”一词,如《著名科学家曹天钦逝世》(1995-02-12, p.4),《著名曲艺家魏喜奎逝世》(1996-03-27, p.4),《著名女书法家萧娴逝世》(1997-01-23, p.4),以及《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逝世》(2004-04-26, p.4)。形容政治/政府和军事领域的逝者最常用的几个词语是“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和“杰出的”。它们通常与其他词语一道,组成高度稳定而刻板的意义结构:与“优秀”搭配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共产党员”;与“杰出”搭配的是“杰出(的)领导人/者”;而“久经考验”和“忠诚”几乎总是成对出现,组成“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表述。同一位逝者往往集这些声望表述于一身。譬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书记韩光同志”(《韩光同志逝世》,2008-09-28, p.1)。

五、结语

任何社会都有一套由人、地点、时间、物件和符号所组成的死亡系统(Kastenbaum, 2016:77)。在媒体化社会中,通过接触媒体上包括讣闻在内的各种死亡报道已成为人们参与死亡系统的一种基本方式。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这种参与也在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边界。譬如,一位读者在阅读《人民日报》讣闻报道的同时,也可能会阅读《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的讣闻报道。

新闻社会学认为,新闻报道是人们获取社会常识(common knowledge)的一种

重要来源(Berger & Luckmann, 1966; Park, 1940)。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类的讣闻报道也同样在形塑着我们的社会常识——尤其是,它通过选择性地叙述一位逝者已然完成的生命史,而让社会公众对于生命、死亡、价值以及意义等形成符合社会期待的认知和态度。如果拉长时间跨度,当讣闻报道成为历史,讣闻对象也就变成了历史中被公开和集体性地记忆的个体。由于并非每个人死后都有机会收获一则讣闻,因此谁能成为讣闻对象以及他/她如何被再现就关乎媒体记忆工作的话语权力问题,可见讣闻报道乃一个竞争性的话语场域。

在国际学术界,讣闻研究的主流学术传统是“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主要围绕不同性别的逝者成为讣闻对象的机会、报道篇幅的长短、配发照片的机会等几个维度而展开。本文在依循该主流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在再现逝者的“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时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歧视/差异。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从我国最权威的党报《人民日报》过去二十年间发表的讣闻报道中,抽取出一个由500篇文章所组成的研究样本。其中,女性逝者(113人)全部进入样本,这么做本质上是在对女性进行“加权”处理。抽样过程有力地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与西方社会一样,女性成为《人民日报》讣闻对象的机会非常微弱。抽样时还得到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发现:《人民日报》的讣闻报道几乎都“转载”自新华社,这在该报的各种报道类型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新华社是社会精英讣闻报道的“首要界定者”,而《人民日报》是“次要界定者”。一个进一步的推论是:在我国,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是一个非自由竞争的报道领域。

关于逝者“资本”的媒体再现,本文得到了一系列研究发现:

就文化资本而言:(1)男性讣闻提及逝者受教育经历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2)不同性别的讣闻在高等教育经历的提及上无显著差异;(3)男性讣闻提及逝者留学经历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

就权力资本而言:(1)男性讣闻提及逝者的职业权力资本量显著地高于女性讣闻;(2)男性讣闻提及逝者的政治权力资本场域宽度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3)男性讣闻提及逝者的政治权力资本量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

就社会资本而言:(1)男性讣闻提及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为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2)不同性别的讣闻在当前国家领导人象征性行为的标题化方面无显著差异;(3)不同性别的讣闻在具名的当前国家领导人数量上无显著差异;(4)男性讣闻提及亲属关系人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5)不同性别的讣闻

在逝者的社会关系人总量上无显著差异；（6）不同性别的讣闻在逝者与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性质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7）不同性别的讣闻在混合关系中的积极关系人比例方面无显著差异。

就象征资本而言：（1）男性讣闻提及逝者的正式职业荣誉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女性讣闻；（2）男性讣闻使用非正式社会声望的形容词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女性讣闻。

由这些发现可得出一个总体结论：尽管女性成为讣闻对象的机会与男性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旦获得机会，她们在讣闻报道中“被再现的资本”却并不见得处于劣势地位，在几个重要方面甚至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现有文献的普遍悲观的结论——“被歧视的女性逝者”，这一结论要积极得多，由此证明了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对于讣闻研究的独特学术价值。

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两点期望。其一，本文采用的是纵贯式个案研究的设计，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采用横截面的或纵贯式的比较研究设计，尤其是对党报和都市报的讣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其二，本文聚焦于讣闻报道如何再现逝者的各种资本，是以文本为中心（text-centered）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从新闻社会学的传统出发，考察讣闻报道如何在媒体组织中被生产出来。

（责任编辑：杨雅）

引用文献 [Reference]

宫留记(2009).《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Gong, Liuji (2009).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Ball, J. C., & Jonnes, J. (2000). *Fame at last: Who Was Who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Obituaries*. Kansas City: Andrews McMeel Publishing.

Bonsu, S. K. (2007). The presentation of dead selves in everyday life: obituaries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Symbolic Interaction*, 30(2), 199-219.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2002).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N. W. Biggart (ed.), *Readings in Economic Soci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 Johnson, M. (2007). *The Dead Beat: Lost Souls, Lucky stiffs, and Perverse Pleasures of Obituaries*. Harper-Collins ebooks.
- Davies, J. (1994). One hundred billion dead: a general theology of death. In J. Davies (ed.), *Ritual and Remembrance: Responses to Death in Human Societ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 Fowler, B. (2007). *The Obituary as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stenbaum, R. J. (2016). *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 (11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 Kastenbaum, R., Peyton, S., & Kastenbaum, B. (1977). Sex discrimination after death.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4), 351-359.
- Kearl, M. C. (1986). Death as a measure of life: a research note on the Kastenbaum-Spilka strategy of obituary analyses.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17(1), 65-78.
- Lawuyi, O. B. (1991). The dialogue with the living: biography in the order of a Christian's funeral service in Yoruba Society.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21(3), 227-240.
-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57).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B. Rosenberg, & D. M. White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Lin, 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ng, G. L. (1987). Organizations and identity: obituaries 1856-1972. *Social Forces*, 65(4), 964-1001.
- Maybury, K. K. (1995). Invisible lives: women, men and obituaries.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2(1), 27-37.
- Moremen, R. D., & Craddock, C. (1998). "How will you be remembered after you di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fter death twenty years later.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8(4), 241-254.
- Spilka, B., Lacey, G., & Gelb, B. (1979). Sex discrimination after death: a replication, extension and a difference.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10(3), 227-233.
- Starck, N. (2004). *Writes of pass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paper obituary practice in Australia,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linders University, Adelaide.
- Starck, N. (2008). Death can make a differ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quality quartet" obituary practice. *Journalism Studies*, 9(6), 911-924.
- Stillion, J. M., & Shamblin, J. B. (1985). Sexism in death. In J. Stillion (Ed.), *Death and the sexes: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ial longevity,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coping skills*. Washington: Hemisphere Publishers.
- Thompson, J. (2010). *Merchants of Culture: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lden: Polity.
- Tight, M. (2008). Dead academics: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academic work and life from obituaries?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6(2), 125-135.